

祖国，你好！

我的名字叫国庆

□文国庆

1959年，母亲怀上了我，根据预产期，我正好是在国庆10周年那天出生。父母觉得这是喜上加喜的事，在我尚在母亲肚子里时，就给我定下了“国庆”这个大名。不料，离10月1日还有两天，我就迫不及待地钻出来凑热闹了。父母痴心不改，给我定下的大名不变。

我姓文，自然叫文国庆。19岁那年，我听到征兵的消息传来，兴奋得睡不着觉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赶到人武部去报名。我把报名表填好后，交给一名干部，他一看我的名字就笑了：“哈哈！你叫文国庆，我叫武国庆，我们是一文一武，真巧啊！”我赶紧说：“这叫有缘千里来相会！大哥，你一定帮我把这军参上。”

后来，我顺利地参了军，扛着枪为共和国守了几年的边疆。

1986年，我27岁了，但我还没有对象。不过，我并不着急，我知道我的名字会给我带来好运气。

果然，运气不久就来了。

一个星期天，我正在一家商场买东西，突然从人群中传来一声呼

喊：“国庆，国庆！”我以为是熟人喊我，就答应了一声。喊我的是一个陌生的姑娘，面对着她，我有些尴尬，正不知怎么才好，只见那姑娘摸着头说：“我头晕得很！”就一头栽倒在地。我一见情况不妙，什么也不顾了，抱起那个姑娘就朝门外跑。好在商场对面就有一家医院，我忙将姑娘抱到医院急救室。医生一边给那个姑娘打针，一边对我说：“你是患者家属吧？不要紧，她这是由血糖过低引起的暂时性昏迷，一会儿就会醒！”过了一会儿，姑娘醒了过来，说：“谢谢你！你也叫国庆吗？我弟弟也叫国庆，刚才商场人多，我找不着他了……”

我赶紧说：“你好好休息，我这就去商场把你弟弟找来。”

在商场广播找“国庆”后，我的面前陆续出现了五个叫“国庆”的人，但我一眼就认出了我要找的国庆。他后来成了我的小舅子。我想不用我说，大家也知道了我的“国庆姻缘”。

当然了，我们是在国庆节这一天喜结良缘的哟！

古代没有国庆

□李景香

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，为何没听说过古代有国庆日呢？其实，古时各朝代没有国庆日，多与无生日有关，《仪礼》《礼记》《周礼》等古籍均无生日与生日礼的记载。那时，人们不觉得过生日有意义，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才有生日一说。

人且无过生日的概念，国家更无这个概念。

“人生自有命，但恨生日希”是孔融《杂诗》中的两句，说的是人每年只能过一天生日，有点儿小小的遗憾。《颜氏家训·风操篇》写道：“江南风俗，儿生一期，为制新衣。”魏晋时期的江南地区，人们流行在生日这一天大吃一顿，以示庆祝。到唐朝时，唐玄宗李隆基规定自己的生日为“千秋

节”，作为国家法定节假日。此后历朝皇帝纷纷效仿，相沿成习。朝廷怎么做，百姓怎么做，过生日的习俗逐渐兴起。不过，人们刚开始只给小孩儿与老人过生日，如果青壮年过生日，人们还会觉得“晦气”，以为这个人巴不得变老。后来，随着观念的转变，过生日才遍及各年龄层。

中国的多数传统节日，多与历法有关。“民以食为天”，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认为江山社稷与农业息息相关。庄稼丰收了，农民吃得好、住得好，自然不会造反。因此，古代的多数纪念日与老天爷有关，而不是和人物、事件有关。所以，中国古代改朝换代了多次，却没有一个“国庆节”也就不奇怪了。

他们都叫建国

□张华梅

在我们身边，“建国”可以说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名字。

我的一个表叔，叫刘建国，出生于1949年10月1日，今年65岁。表叔生在新中国，长在红旗下，是村里第一个考上中学的人。中学毕业后，他报名参军，担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，转业后回到家乡，做了一名农民。后来，表叔当上生产队长。改革开放后，表叔带领乡亲们开展种植、养殖等多种经营，为建设家乡做出了贡献。

我上小学时，班里竟然有两个王建国，他俩都是在国庆节那天出生的。对这两个同名同姓的人，班主任很伤脑筋，动员其中一个改名，可是两个人及其家长都不同意。最后不得已，根据他们的身体特征，一个被称为大建国，一个被称为小建国。大建国个头高，身体壮实；小建国瘦小干瘪，营养不良。两个王建国长得不一样，学习成绩也不同。小建国刻苦用功，成

绩名列前茅，如今已是一名局长。大建国虽然身体强壮，成绩却不好，后来当了瓦工，如今在南方为城市建设流汗出力。

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叫汤建国，他不是出生在国庆节，本来名字也不叫建国，是他自己非要改成建国的，听说他小时候因为自己不是出生在国庆节还跟母亲怄过气。汤建国脑筋活，上学时就喜欢做小买卖，卖本子、钢笔之类的给同学。高中毕业后，汤建国就开始经商，从小本经营到如今拥有几家公司，他的确有经商方面的天赋。最有意思的是，汤建国的儿子出生在国庆节那天，终于圆了他的国庆梦。我们经常开玩笑让他把名字让给儿子，他的儿子才是名副其实的“汤建国”。

走上社会以后，我遇到了数不清的“建国”。这带有时代印记的名字，带着人们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。

在非洲过国庆

□刘卫

那年国庆节前夕，我随公司贸易小组去非洲三国推销公司新产品。

我们头站去了埃塞俄比亚。来不及游览“非洲屋脊”的奇异景致，我们马不停蹄地拜访客户，签下很多合同，收获丰厚。然后，我们又匆忙走访了赞比亚和乌干达。出于安全考虑，我们又回到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，在那里吃住。

那几天，当地并无异常。商务闲暇，我们筹划国庆节庆祝活动，挂国旗，用彩色气球和塑料花装饰接待室。常参赞要每个人出节目助兴。我们贸易小组的成员兴致很高，准备把刚签的两笔大单当作国庆节“献礼”。

9月30日晚上，大家怀着对过节的期盼，很晚才进入梦乡。没承想，10月1日凌晨两点左右，外面骤然传来一阵阵噼里啪啦的脆响，间或还有沉闷的炮声。常参赞逐个房间敲门，把我们睡梦中叫醒，大

喊：“快到大使馆地下室躲一躲，可能发生了政变。”我们赶紧带上重要的资料和少量的生活用品，冒着流弹，迅速拥入地下室。

我们带去的蜡烛此刻派上了用场。在忽明忽暗的烛光中，使馆领导让大家镇定下来，就应对突发政变作了部署：临时出国人员在叛军可能攻入首都之前，由相关单位负责人冒险申领加急出境签证，派车护送撤离到邻国。

常参赞很快拿到签证，他特意在越野车前头挂了一面中国国旗，并带上足够的食物，冒着流弹，经过一道道政府军和叛军沿途设立的检查站并接受盘查。有了车前中国国旗这个非洲人都认识的“路标”，再加上事先准备的小礼品，我们一路上得到了士兵们的礼遇。第二天清晨，我们安全抵达邻国逃脱险境。

那个国庆节过得不平常，充满传奇色彩，亲爱的祖国给我们筑起了一道安全线。